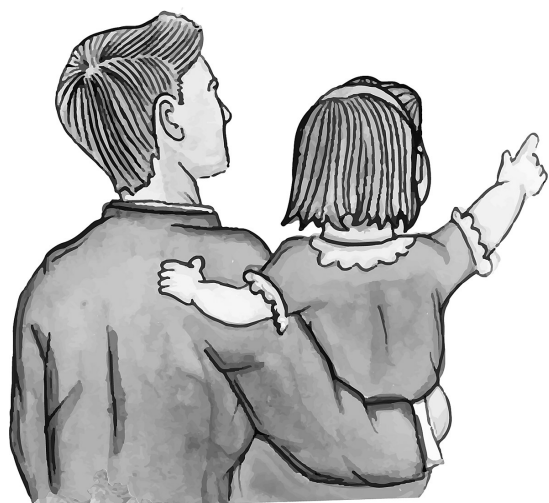


往事漫忆



怀念父亲

冯美联文

父亲是农历七月十五去世的，这个日子在农村被称作“鬼节”。每年这一天，如果家中有去世的老人，出嫁的女儿就会回去，到坟地里烧纸祭奠。

那年的七月初一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气若游丝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”出乎意料的是，父亲竟一语成谶。

三天后，父亲入土为安。出殡的时候，我没有像送别母亲时那样号啕大哭，只是默默地暗自垂泪，在脑海中搜寻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次我着凉生病，盖着厚厚的棉被还瑟瑟发抖，感觉脊背上嗖嗖冒冷风。父亲见状，伸出宽大厚实的手掌，在我背上使劲地搓来搓去。他的手掌很粗糙，刺得我光滑的皮肤有些疼。我一个劲儿地喊让他住手，他却不肯，直到把脊背搓得红红的才罢手。父亲让我躺好，给我掖一掖被角，我后背上一阵阵灼热。父亲给我端过来一碗热腾腾的姜糖水“逼”我喝下，不一会儿，我身上就发汗了。

我曾被医生戏谑地称为“用筐驮来的女孩”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突发疾病，母亲不知所措，急得直掉眼泪。父亲二话没说，找了一根结实的木棍，牢牢地绑在自行车的后座架上，又把一个柳条筐挂在上面，然后把我小心翼翼地放进去，朝着医院的方向飞奔。

医生说，哪怕再晚来五分钟，我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怜爱地注视着有惊无险的我，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长长出了口气。若干年后，医生们还能一眼辨认出我是那个“用筐驮来的女孩”。

偶回老屋，室内陈列如旧，只是不见了父亲。但是，我总觉得他还坐在靠窗的沙发上谈笑风生；总觉得他还在电视机前饶有兴趣地看咿咿呀呀的京戏；总觉得他还半卧在榻，眼睛里闪耀着我们一进屋的惊喜。而此刻，伫立在空荡荡的家中，这一切恍如隔世。

有一次，在朦胧的睡梦中，我清楚地听到父亲熟悉的脚步声。他在客厅里转了一圈，来到卧室注视了我一会儿，端起床头的一杯水一饮而尽，转身离去。我挣扎着想坐起来，眼睛却睁不开，嘴也不能出声，身如被绳索捆绑，欲动不能。好不容易醒来，我慌忙查看杯子，里面的水纹丝未动。但是我分明嗅到了父亲的气息，听到了他嚓嚓的脚步声，却留不住他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不愿意相信那只是一场梦。

我还记得，在青春叛逆期，我听不进任何劝告，扬言退学，一副文艺青年的桀骜不驯。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涂涂写写足有半年，后来是堂姑拎着一瓶全兴酒，带着我重返校园。

参加工作后，和已经满头华发的堂姑闲聊才得知，当年我离开学校的那段日子，父亲白天忙完地里的活儿，晚上就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借着万家灯火，摸索着去堂姑家和她商量我的事情。父亲央求堂姑帮他想办法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我的学业，并把一瓶酒塞到她手里。

听了堂姑的诉说，我心里不禁一颤。这么多年，那段时间的烦恼父亲只字未提。已为人母的我，能想象得出父亲当年的无奈和焦灼不安，能体会到威严的父亲向少不更事的我卑微低头时的复杂心情。

那时我才明白：原来，母爱絮絮不止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成长中的每个细节，像潺潺溪流一路陪伴；而父爱果敢威严，即使承受风霜雨雪也沉着坚定，像挺拔伟岸的大山，静默中就纠正了我们人生中的偏差和错误。



想起票证时代

赵万玉/文

前几天，我在翻箱倒柜打扫卫生时，无意间翻到了久违的蔬菜票、粮票、煤票……见到这些多年不见的“老朋友”，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那早已逝去的票证时代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我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。每次回家，爸爸妈妈总不忘给我带上几十斤费尽周折用家里口粮换来的粮票。这也是我与票证“交朋友”的开始。有了这些寄托着父母爱意的粮票，我才能在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填饱肚子，完成紧张而繁重的学业。

后来，我在城里参加了工作，接着又成家立业，我的“票证朋友”也越发多了起来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那个时代，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些“朋友”。它们的分工既明确又细致：买布要布票，买棉要棉票，买柴要柴票，买煤要煤票，买自行车要车票，买肉要肉票，就是买糖、买月饼，也要带上特定的食品票。

那个时代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。记得在1979年深秋，我带着全家的菜票，顶着寒风，连夜到街头菜站排队买过冬的大白菜，排了一夜队轮到我时，却不知什么时候把弥足珍贵的菜票弄丢了。任凭我怎样解释，营业员只是认票，结果我拿钱也没有买成。可见票证在当时的的重要性。

那个票证时代，其实也是物资供应紧张的时代。平时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要凭票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更是票证“大显神威”的时候。拿着五颜六色的票证，在不同的地方排队，买回全家翘首期盼的年货，过年的餐桌上才有了丰盛的食品。

在票证时代，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十分容易满足。多供应半斤肉或者二两油，人们就会笑容满面，心满意足。在票证时代，那些高档消费品更是“一票难求”。1988年春节前夕，市五金公司从厂家购进500台“虹美”牌彩电，把票分发到各单位，我有幸获得一张。按照票上规定的时间，我在大年三十上午早早来到五交化大楼排队。哪里是买，简直是“抢”，不到两个小时，500台彩电就售光了。待我回到家，把购得的彩电打开后，发现屏幕上有擦痕，赶忙回去调换。见到营业员说明情况，没想到营业员却说：“我这儿还剩两台，一台没影儿，一台无声，你换哪台？”闻听此言，我只好作罢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市场经济早已代替了计划经济，票证时代也随之远去。但我们这些过来人，对于那逝去的票证有一种复杂的感情：它既限制了我们的购买自由，又保障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。它像一位老朋友，与我们日日相随，陪我们度过了那个特殊又难忘的时代。“只认票不认人”，在给人们带来某些不便的同时，却又维护了大家平等的购物权利。小小的票证，既记录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历史，也见证了那段岁月的辛酸与无奈。

老照片

第一张全家福

李荣根 文/供图

1967年我在石家庄市参加工作后，依然和在肃宁县务农的家人分居两地，就连孩子们出生之时，我都没能陪在老伴身边。在孩子们多次恳求下，我于1971年5月回到老家，准备照一张全家福。

从来没有照过相的孩子们听说后很高兴，把他们当时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，在老伴和堂妹的带领下，欢呼雀跃地跑了6里多路，然后在窝北镇的照相馆里，照了这张全家福。

老伴一个人在家养育着4个孩子，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过着忙碌且艰辛的生活。一次，她在高粱地里耕作时，不慎掉进了一个大口的井里，慌乱之中喝了几口脏水，然后抓到了井中尚未清除的草绳，并大喊救命。在附近锄地的乡亲们见不到她干活了，又听到了喊声，急忙跑了过去。大家从村里找来结实的绳子，把她救了上来。



直到1985年，老伴和两个儿子的户口才迁入市里，从此结束了我们夫妻多年来两地分居的困难境况。在城市生活花销大，我的工资也不高，她就学校门口摆了个卖冷饮的摊点，早出晚归，进货守摊，挣钱补贴家用。

2008年5月23日，老伴不幸离世。我们共同生活了50年，相互理解，同甘共苦，从没闹过大的矛盾。每次看到这张全家福，便想起了和老伴共同走过的难忘时光。